

莫迪政府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

宋伟 张旺

[内容提要] 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以来,印度实施从“东向政策”到“东进政策”的战略调整,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进一步融入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当前莫迪政府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主要依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加强海上安全合作;联合东南亚国家积极干预南海问题;与美日澳合作加强军事能力和军事存在;向南太平洋地区扩展影响力。印度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一是因为印度拥有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二是因为亚太地区是印度将影响力超越南亚次大陆、推进世界大国梦的优先方向。亚太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其优先方向,主要是基于印度周边大国博弈的格局以及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基础。由于印度北部陆地安全形势的牵制、印度与主要合作伙伴在对抗中国立场上的不一致,以及印度海军军备本土制造能力难以支撑远洋战略等因素,印度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仍然面临诸多制约。

[关键词] “东进政策” 亚太安全 印度 对外政策

[作者介绍]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亚太地区问题;张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南亚地区问题。

2023年以来,中国和菲律宾海上冲突不断,围绕仁爱礁的争端使得南海局势持续升级。在此紧张局势下,2023年12月,印度海军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开展双边军演,旨在帮助菲律宾“保护领海”。印度在南海问题上挑事,联合菲律宾施压中国的目的不言而喻。实际上,近年来印度不仅持续插

手南海问题,而且不断介入其他亚太安全事务。2023年5月,印度组织越南、新加坡等7个东盟国家在南海开展为期两天的军事演习;9月,与美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的高级军官在新德里举行会议,讨论亚太地区安全事务;11月,与俄罗斯在孟加拉湾军演,表示演习目的是全面发展和加强俄印海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威胁,保障亚太地区民事航运安全等。^①可见,印度正在成为亚太安全事务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其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战略和实践都在不断加强。莫迪政府介入亚太安全始于其“东进政策”,2014年莫迪政府将传统“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对外宣称目标是促进印度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文化联系和安全战略关系,^②其走出南亚次大陆、进入东亚和太平洋的雄心表露无遗。目前,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万亿美元,但相比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来说仍然差距很大。印度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尤其是卷入有争议的地区热点问题,必然加剧地区安全的紧张局面。

一、莫迪政府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路径

以1996年印度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为起点,印度开始参与亚太安全事务。除东盟地区论坛外,印度相继加入了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海事论坛三大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开展海上救援、反恐等有限的非传统海上安全合作。自2009年起,印度国防报告多次表示,印度海军活动范围从印度洋扩大至包含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印度将海洋战略涵盖亚太地区,意在跳出南亚次大陆这一“传统势力范围”,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

^① “Russia Holds Joint Naval Drills with India in Bay of Bengal Defense Ministry,” <https://sputniknews.in/20231123/russia-holds-joint-naval-drills-with-india-in-bay-of-bengal-defence-ministry-5544484.html>.

^② “Lok Sabha Unstarred Question No.4062 To be Answered on 23.12.2015,” Ministry of Commerce & Industry,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s://commerce.gov.in/wp-content/uploads/2021/08/USQ1457-merged.pdf>.

力。总的来说，“东进政策”实施以前，印度国家整体实力有限，处于亚太地区的边缘地位，更多扮演合作参与者的角色。但这些战略构想和初步实践为莫迪政府加强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奠定了重要基础。莫迪政府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与东盟加强多边海上安全合作。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次区域组织，东盟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都很大，与中国、美国的关系也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印度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的合作只能是聚焦不敏感的功能性领域。当前，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毒品贩卖、军火走私、海盗劫掠等跨国犯罪活动日益严重，导致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2015年，莫迪政府的《确保海洋安全：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宣称，海盗与武装抢劫威胁印度海洋经济活动，其他犯罪行为包括毒品和军火走私、核原料走私、人口贩卖等。印度东北各邦还面临打击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的压力，叛乱分子可以通过海上渔船，获得来自缅甸、泰国非法毒品交易商和军火商的武器供给。^①2016年莫迪在第14届“印度—东盟峰会”上表示，东盟是印度“东进政策”的核心，“东进政策”下印度关注重点从经济领域向安全领域转变。^②为此，印度持续加强与东盟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上，印度坚持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网络中心。印度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与成员国进行外交接触和安全对话，加入以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为主的第二对话轨道，推进防务、反恐等领域的安全合作；参与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盟海事论坛、北京香山论坛等一批学术性安全论坛，探讨国际安全形势等敏感问题。2022年，在最新一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印度国防部长强调东盟中心地位是印度“东进政策”的核心，印度将

^① Aditi Chatterjee, “Non-tradi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Maritime Affairs*, Volume 10, 2014, p.89.

^② 孙现朴：《印度东向政策视阈中的亚太多边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8页。

致力于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发展。^①2022年是印度与东盟建立对华关系的三十周年,双方将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反复强调把东盟放在其“印太安全与增长构想”的中心位置。^②

在实践中,印度和东盟的海上安全合作不断强化。2020年,双方通过《落实东盟—印度面向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海洋安全合作列居首位。^③印度除与东盟国家开展海上反恐演练、应急救援、人道主义援助等常规海上安全合作外,双方的军事演习、联合巡航日益常态化。2022年,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海域邀请46国,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米兰系列”联合军演,其中东盟国家和传统准军事同盟美日澳是主力军,旨在制衡中国的军事影响力。2023年5月,印度与东盟七国的海军在南海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印度首次派遣军舰参加与东盟国家的海军演习。印度和新加坡是本次演习主导国。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军事演习活动呈现出网络化的态势,同时双方安全合作向军备采购、舰艇访问、允许双方海军停靠对方港口等方面拓展,使得印度与东盟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更加便利。

(二) 与东盟成员国双边合作干涉南海问题。鉴于东盟的复杂性,印度难以采取过多动作;而在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中,印度明显强化了对南海问题的实质干预。一是印越防务合作聚焦南海。自2014年以来,印越两国多次发表联合声明,主张尊重“南海仲裁案”结果、“维护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基于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④双方除在南海区域频繁开

① “ASEAN-India Maritime Exercise Stresses Cooperation, Interoperability,” 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 May 17, 2023, <https://ipdefenseforum.com/2023/05/asean-india-maritime-exercise-stresses-cooperation-interoperability/>.

② “India-ASEAN Relations,” <https://www.mea.gov.in/Portal/ForeignRelation/India-ASEAN-Relations-August-2018.pdf>.

③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India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ess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1-2025),” ASEAN,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ASEAN-India-POA-2021-2025-Final.pdf>.

④ “India-Vietnam Joint Statement during State Visit of President of Vietnam to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March 3, 2018, 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india-vietnam-joint-statement-during-state-visit-of-president-of-vietnam-to-india/; “India-Vietnam Joint Vision for Peace, Prosperity and Peopl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21, 2020,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3324/india++vietnam+joint+vision+for+peace+prosperity+and+people>.

展军事演习，擅闯中国南沙岛礁临近海域外，印度还在越南胡志明市投资修建卫星追踪和监测中心，双方共享卫星基地数据，中国沿岸的海军基地、在南沙群岛的军事动向均处其监测范围。^①越南为印度海军力量深入南海提供重要中转地支撑，印度军舰到访越南港口纵深化，从最南部胡志明市逐步延伸至北部芽庄、岘港、海防，直至亚洲最大军港金兰湾，这意味着印度可以通过越南进入大部分南海海域。双方还积极开展军备合作。印度积极向越南出口军火，包括“阿卡什”防空导弹、“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以及巡逻艇等，并为越南直接解决“米格—21”战斗机等俄式装备的维修升级等问题。2022年双方签署《印越防务伙伴关系2030愿景声明》，扩大防务伙伴关系范围与规模，缔结首份《相互提供后勤支持谅解备忘录》，允许对方使用各自军事基地进行维修和补给，为远洋行动提供便利条件。^②2023年印度还向越南移交12艘高速护卫舰，提供5亿美元防务贷款，双方紧盯南海区域的防务合作在东盟国家中最为全面深入。

二是印度积极拉拢新加坡和菲律宾搅局南海。新加坡作为印度“东进政策”跳板，允许印度使用樟宜海军基地，为印度军事影响力拓展至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南海和亚太地区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印度一直为新加坡陆军和空军提供军事训练，双方也建立有常态化军事演习机制，2023年9月，印度与新加坡的军事演习范围首次拓展至南海国际水域。菲律宾作为南海问题直接相关方，成为印度重点关注的安全伙伴。2021年印度海军派遣“兰维杰号”导弹驱逐舰、“科拉号”导弹护卫舰在南海海域与菲律宾海军护卫舰举行联合演习。2023年12月，中菲南海争端加剧之时，印度再次派遣军舰与菲律宾在南海军演。2022年，印度向菲律宾出售最大一批国防装备，其中不仅

^① 《印度将在越南建卫星追踪中心，监视中国南沙动向》，人民网，2016年1月26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6/0126/c1011-28084632.html>。

^② “Vietnam, India Agree to Foster Defense Partnership,” Vietnam+, June 8, 2022,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india-agree-to-foster-defense-partnership/230825.vnp>。

有19架双引擎直升机、7架“北极星”海军直升机、8架“道尼尔”228海上巡逻机等常规装备，^①还包括超音速导弹“布拉莫斯”导弹，其射程超过450千米，致使南海黄岩岛处于其控射范围内。2023年菲律宾表示计划从印度采购第二批“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

(三) 加强与美日澳军事合作，提升地区介入能力。印度不仅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深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而且不断提升与美日澳准军事同盟的双边安全合作。以“四边安全对话”为核心，印度与美日澳建有全面军事合作体系。^② 四国建立了“2+2”部长级对话机制，在防务装备、军事演习、情报共享、后勤补给四大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声明推进“自由开放且繁荣的印太”，重点关注中国东海、南海区域的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等问题。2023年四国共同声明表示：“将采取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加强保护和开发近海资源的能力，确保航行和飞越自由，促进海上交通线安全。”^③ 2020—2023年，四国连续举行4次“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2023年的“马拉巴尔”军演在澳大利亚沿海举行。该演习内容从反恐、海上搜救等普遍性军事外交科目，拓展至反潜、防空等合作性军事外交科目。

在双边层次，印度与美日澳开展侧重不同的合作。其中与美国重点加强国防工业合作。2023年6月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访印，表示要进一步深化美印防务关系，双方敲定未来5年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加快在空战、陆地机动系统、情报侦察和弹药武器等领域的技术合作，共同研发和生产新型装备，旨在让印度摆脱对俄罗斯的防务依赖。^④ 随后美印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

① “India Negotiating Sale of Maritime Helicopters to Philippines,” Anasayfa/defense News, December 6, 2021.

② 美印之间的主要国防合作协议包括：《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合作协定》《军事信息安全一般协议》《后勤交流备忘录协议》《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印日之间的主要国防合作协议：《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保护机密军事情报措施协定》《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印澳之间的主要国防合作协议：《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军事后勤支持协定》《印澳海军指南》。

③ “Joint Statement: Qua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March 3, 2023,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6323/joint+statement+quad+foreign+ministers+meeting>.

④ “Secretary Austin Concludes India Visi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5,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416249/secretary-austin-concludes-india-visit/>.

方防务伙伴关系已成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支柱,致力于加强海上安全、推动签订互惠国防采购协议、将印度打造成美国海军前沿部署资产的维护和修理中心,实现双方国防工业合作无障碍。^①

印度与日本的合作明显针对中国。莫迪执政以来,印日建立“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战略互动重点定位于“印度洋—太平洋”区域。^②双方建立“印日海事对话”“印日东向行动论坛”等平台促进海上安全合作。2020年双方签订军事物资和服务共享协议,允许日本使用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军事设施,该岛作为印度海军投射至亚太地区的跳板,开放日本对该岛的使用权,进一步提升双方在亚太军事合作一体化水平,日本也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提升对印军售。同时双方多次针对亚太海上争端、通道安全等密切磋商,批评中国在南海搞“扩张主义”“不参与仲裁违反国际法”,谴责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督促朝鲜实现半岛无核化。^③2023年1月,印度与日本正式启动首次空中联合军演,防务合作不断深化。

此外,印度积极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印澳安全关系相比美印、印日关系一直稍显薄弱,2020年,印澳签署《军事后勤互助支持协议》《科学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安全合作关系提升。2021年发布《印澳海军指南》,旨在通过“印度洋海军论坛”“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环印度洋联盟”等加强合作,^④相继开展联合军演和军事人员交流,允许双方军舰和飞机使用彼此军事基地进行后勤补给。2023年6月莫迪访问澳大利亚,双方针对经

^①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White House, June 22,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joint-statement-from-the-united-states-and-india/>.

^② “Japan and India Vision 2025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Working Togeth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s_sa/sw/in/page3e_000432.html.

^③ “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November 11, 2016, <https://pib.gov.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53534>.

^④ 《印澳签署海军合作指南》, 人民网, 2021年8月25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1/0825/c1011-32207133.html>。

贸、防务合作等议题举行双边会谈，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化。

(四) 安全战略贯通印度洋与南太平洋地区。印度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进程，还表现为立足印度洋，逐步向亚洲东部扩展的同时，也不断向南太平洋地区拓展安全势力范围。印度在与美日澳等主要亚太大国的安全合作中大多扮演参与角色，但与南太平洋小国的安全合作体现出更强的主导性和排他性。印度试图将其主导的印度洋安全秩序覆盖部分南太平洋国家。其主导建立了“印度洋海军论坛”，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太平洋海域国家拉拢其中，旨在加强地区性海洋安全问题合作，并将在该区域有重要利益的中国和美国排除在外，其主导印度洋秩序并辐射太平洋国家的目的不言而喻。印度发挥关键作用的“环印度洋联盟”除南非等印度洋沿岸国家外，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太平洋海域国家。印度以“环印度洋”名义将部分太平洋小国囊括其中，视南太平洋区域为其主导的印度洋秩序的一部分。印度在其中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较强，占有重要地位。2021年以来，“环印度洋联盟”成员国不断加强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海盗袭击、毒品泛滥等海洋安全挑战的区域合作。

与此同时，印度积极加强与南太平洋国家合作，影响力向南太平洋地区延伸。早在2017年印度便在斐济举行“印度—太平洋岛屿可持续发展会议”，2019年，印度在参与联大会议期间又与12个太平洋岛国举行首脑会议。印度十分重视澳大利亚的中介作用，通过与澳大利亚这一地区主导国的合作来扩大印度在南太区域的影响力。澳大利亚作为贯通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关键，积极推动“环印度洋联盟”倡议的地区合作向东印度洋地区扩散。^①2023年6月莫迪再次访问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重启第三届“印度—太平洋岛国论坛”，这表明印度日益重视南太平洋国家在亚太区域

^① 卓振伟：《澳大利亚与环印度洋联盟的制度变迁》，《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第14页。

的战略安全作用,并向南太平洋拓展势力范围。

二、莫迪政府重视亚太安全事务的原因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对外延伸其安全影响力主要有三个方向:向北经过阿富汗逐步扩大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向西加强与非洲东海岸的合作;向东介入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从目前来看,印度在这三个方面都在加强,但相比对亚太地区的介入,对中亚和非洲东部的介入存在明显的局限:印度虽然在阿富汗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阿富汗的贸易不断增加,但其中亚地区仍然难以匹敌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东部和其他一些地区,印度的影响力的确让人瞩目,尤其是印度裔的移民所拥有的财富和影响力,但印度在安全领域的介入相比传统的欧洲大国、中国和美国仍然有限。相对而言,亚太地区成为印度对外扩展安全影响力的优先方向,并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既与印度的战略诉求有关,也与亚太地区力量格局不无关系。

(一) 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印度认为,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对其独霸南亚地区的雄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制衡中国是其外交的根本战略利益之一。当前中印地缘政治冲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印边界形势持续不稳定。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难以短时间达成的情况下,双方是否再次爆发领土冲突仍然存在不确定性。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后,印度的边境政策具有强势争夺、激进冒险和寻机获利等特点,^①尤其莫迪政府在面对国内政治危机时,惯于将边界冲突作为缓解国内矛盾、对华施压的手段,给双方冲突管控带来更大风险。二是近年中印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愈发激烈。中国与环印度洋地区的37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在印度洋海域开展海上巡航等活动,并与印度洋沿岸国家

^① 包善良:《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1期,第26页。

共同建设港口,印度国内炒作中国实行“珍珠链战略”,诬称中国在对印度实行海上安全包围,威胁其在印度洋区域的主导地位。

面对中印在北部边境陆地的冲突和争端,以及双方在印度洋的安全竞争态势,一方面,印度在北部陆地持续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部署,诋毁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在印度洋地区,印度通过“季风计划”加强与印度洋国家的历史文化联系,并主导“印度洋海军论坛”“环印度洋联盟”等多边合作平台和机制,坚决将中国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印度国内产生“以海制陆”战略倾向。印度前陆军北方军区司令表示,在难以将陆军、空军力量提升到能够单独应对中巴边界两线作战的情况下,印度将不得不“以海制陆”。^①2021年印海军参谋长哈里·库马尔宣称,当中印边界局势紧张时,印度海军实际上发挥着威慑中国海上利益,减缓中国陆地压力的重要作用。^②因此介入西太平洋尤其是中国南海成为印度的战略选择。通过与东盟国家合作干预南海问题,印度意欲实现从东面牵制中国,减缓其西部战略压力。特别是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设联合司令部,部署东部海军舰队及大型战舰,将其作为“米兰系列”联合军演常驻地,都瞄准威慑中国的战略目的。

(二)对周边大国博弈格局的综合权衡。印度一直将自己视为印度洋的主导者,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享有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战略地点和通道。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印度介入到亚太安全事务中具有相对便利的地理条件,力量投送的距离比较短。尽管印度也可以通过海上到达中东和非洲东部,但是相对距离较远,而且和这些地区的文化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从周边大国博弈的态势来看,印度必然选择以亚太

^① Deependra Singh Hooda and Happymon Jacob, “Dealing with India’s Two-front Challenge,”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dealing-with-indias-two-front-challenge/article33439804.ece>.

^② Abhishek Bhalla, “Increase in Indian Navy’s Budget Aims at Enhancing Fleet to Deter Chinese Navy Expansion,” <https://www.indiatoday.in/business/budget-2022/story/increase-indian-navy-budget-aims-enhancing-fleet-deter-chinese-navy-expansion-1907972-2022-02-02>.

地区为优先方向,一方面可以从东南亚和海上对中国形成一定的牵制,服务于印度称霸南亚的地区雄心和与中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印度可以借此建立和美国、日本等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目前这种合作关系已经上升到“准同盟”层次。虽然印度希望向中亚地区不断扩展势力和影响力,而美国也支持它这样做,但是短期内由于受实力的限制,其无法超越俄罗斯和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反而可能会恶化与传统准盟友俄罗斯的关系。

通过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印度可以实现两个方面的战略目标:联合一些亚太国家制衡和牵制中国;获得美日澳等国更大力度的支持,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迅速崛起。事实上,莫迪政府加强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大背景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印太”战略的出台。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从而十分看重印度在制衡中国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美视印为“最大的发展中民主国家”,印度可以在价值观、产业链承接、战略威慑等方面成为美国的一个主要伙伴,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与印度仍然存在许多摩擦,例如印度和俄罗斯的密切军事合作、印度市场不够开放、印度人权存在严重问题等情况下,仍不断升级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印作为美“非北约主要盟国”之一。在此背景下,印度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无疑具有便利条件。

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虽然这一区域并不能给印度带来多少实际的物质利益,但印度积极追随中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投入,期望在这一地区获得更大影响力。南太平洋岛国近年成为大国地缘竞争的热点区域,中美等纷纷强化在该地区的战略投入。2022年5月举行了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不断深化双方在经贸、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美国也动作不断。2023年9月,第二届“美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召开,重申建立“和平、和谐、安全、包容、繁荣、有韧性的太平洋地区”共同愿景。^①美英日澳

^① 申震群、顾承启:《美国太平洋岛国政策的转变及其效应》,复旦发展研究院,2023年11月11日, <https://fddi.fudan.edu.cn/b8/d3/c21253a637139/page.htm>。

新五国发布“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支持南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安全，进一步提升太平洋区域主义。^①印度更是将南太平洋视为其印度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南太平洋成为新的大国竞争热点，印度将安全战略触角向这一地区延伸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欢迎，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目前，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推动下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域外大国纷纷介入，这为印度向亚太地区扩张影响力提供了有利氛围。近年英国以“五国防务安排”关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以“印太战略”深化同亚太盟友和伙伴的合作。2022年7月至10月，英国航母打击群途经马六甲海峡前往日本，与印度海军举行代号为“康坎”的联合军演，印度海军出动“拉吉普特”级驱逐舰参加演习。法德也提出各自“印太战略”，积极参与“印太”军事安全合作。2021年法德参与美日印澳在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演，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开展为期7个月的“印太”之行，与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联合军演。2022年法德印等国在澳大利亚北部共同参与“漆黑—2022”联合空中军演，被认为是“亚太版北约”的集体行动。2023年德国国防部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表示将继续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法国还与印澳建立三边机制，针对海上安全、海洋环境治理、海军交流开展合作。通过与域外大国的合作，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印度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敏感性和被集中针对的可能性。

（三）与亚太的地缘、经济和文化联系。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可以划分为四个圈层：印度陆地、南亚地区、环印度洋地区、世界其他地区。环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亚太处于这一圈层当中。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指出，在将来，太平洋将代替大西洋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

^① 《关于宣布“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的联合声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2022年6月25日，<https://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jointstatementannouncementpartnersbluepacificinitiative.html>。

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但不可避免将在那里发挥重要影响。^①这反映了印度对亚太发展成为世界中心的基本判断,以及亚太在印度大国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2015年印度海军《确保海洋安全: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将红海、亚丁湾等印度洋区域划为优先利益区域,中国南海、东海和西太平洋区域划为次优先利益区域。^②2019年印度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描绘了印度维护地区和平以及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梦想,^③其中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在于增强战略自主,维系大国力量平衡,使印度成为尼赫鲁所言的“有声有色的大国”,抑或莫迪时代追求的“世界领导型力量”。^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印度大国梦的成长路径是:摆脱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束缚,以东南亚地区为突破口,走向亚太地区,再从亚太走向世界。^⑤

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不仅在地理上具有极大连通性,而且在人口、宗教和文化方面也存在密切联系。当前印度移民遍布东南亚,历史上印度裔商人和僧人曾迁往东南亚国家,佛教、印度教和印度文化在当地广泛传播,两地人民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根源,早期东南亚国家甚至被称为“印度化国家”。^⑥近代以来,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均被欧洲列强殖民,印度独立后积极支持亚洲国家解放斗争,常以亚洲最大民主国家自居。当前,印度政府注重软实力外交,将印度佛教文化、民主政体和东南亚领袖传统视作软实力资源,莫迪倡导“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强调“民主”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佛教是密切印度与亚洲国家关系的“粘合剂”。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及宗教文化联系,有利于为印度介入亚太安全,加强

①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向哲瀚、朱彬元、杨寿林译:《印度的发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3—494页。

② “Ensuring Secure Seas, India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Indian Navy Naval Strategic Publication(NSP)1.2,” Indian Navy, October 2015, https://www.indiannavy.nic.in/sites/default/files/Indian_Maritime_Security_Strategy_Document_25Jan16.pdf.

③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1, https://manifesto.inc.in/pdf/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gen_hooda.pdf.

④ 胡仕胜、王君:《印度国家安全战略:诉求、成因与实践》,《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32页。

⑤ 余芳琼:《莫迪政府的亚太政策:从“东向”到“东向行动”》,《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26页。

⑥ [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21页。

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奠定重要的政治互信和沟通交流基础。

同时,亚太地区对印度经济发展日益重要。当前亚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超过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地区。^①2014年“东进政策”实施后,印度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和投资自贸协定,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签订《全面经济合作协议》,召开东盟与印度经济合作磋商会。印度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稳定增长,经贸总额超过印美和印欧。近年印度也一直申请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亚太已经成为印度不可缺少的经济利益增长点。亚太地区自由贸易政策和更高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为印度国内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和市场来源。莫迪政府深度融入亚太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借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资本和市场,构成其“东进政策”首要努力方向。因此通过安全和防务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为印度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往来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成为印度以“东进政策”介入亚太安全的重要动能。

三、莫迪政府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制约因素

莫迪政府要深度介入亚太安全事务也面临不少局限因素:北部陆地严峻的安全形势造成牵制、印度在亚太的安全竞争力不敌中美,中美主导的亚太安全格局留给印度的空间有限,东盟与印度存在较大战略分歧,对抗中国立场并不一致。同时印度海军军备本土制造能力有限,限制其大规模远洋军力投送能力,难以支撑其远洋战略。

第一,印度北部陆地安全形势对其造成牵制。在印度地缘战略中,“西联”与“东向”相对,前者致力于与西亚和海湾国家的经济联系和能源供应

^① 《坚守初心,共促发展,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国务院公报》,2022年第33号,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29413.htm。

关系,以满足印度60%以上的原油进口需求,^①沙特等国家也是印度外出劳工主要就业地,随着海湾地区政治形势向好,为双方经济合作提供更多机会;“南控”主要控制印度洋及关键运输通道,印度洋提供全球一半以上集装箱、70%石油运输,^②对其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北望”关系到印度北部边境安定,主要体现为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境争议问题、东北各邦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管控问题,以及来自缅甸、越南边境的毒品走私、军火贩卖等犯罪问题。相比于上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利益,向东介入亚太安全更多体现印度地缘政治博弈和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只是其扩充大国梦的一部分。一旦印度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亚太将是其战略收缩的首要方向。

从当前印度安全环境看,北部陆地面临的地缘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且均难以短期内解决,任何一项议题管控不善都可能引发印度国内社会动荡,并影响到执政党执政基础。目前中印双方始终未对划定边界实际控制线达成共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边境争端将继续存在。印度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孟印缅经济走廊”是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印度在陆地上同时受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威胁。2023年以来,印巴由于对方军事活动越境而在克什米尔地区频繁交火。同时受锡克教徒在加拿大被印度教徒刺杀事件的影响,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冲突激化,暴力活动不断上演。这些都表明遏制北部陆地的现实威胁仍然是印度维系安全稳定的关键。北部陆地安全形势与印度的主权和领土权益直接相关,发生地区冲突的可能性远大于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大国博弈错综复杂,反而提高发生冲突的成本和阈值。因此从印度的现实安全而言,重点是保证陆地安全,介入

^①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2-full-report.pdf>.

^② 《马六甲:世界上最繁忙的海运“通道”》,《经济参考报》网站,2018年9月21日,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8-09/21/content_47073.htm。

亚太安全事务的目标优先性有限。

第二,印度与美国和东盟存在战略利益分歧。印度并未放弃战略自主,避免亚太议题上完全倒向美国。美印联合声明发布以来,双方在高科技、国防工业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显示出非同寻常的伙伴关系。但从以往实践来看,印度外交遵循战略自主原则,一直避免完全靠向美国。例如在对俄关系上,印度对俄罗斯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保持中立,拒绝谴责和制裁俄罗斯。2022年西方对俄制裁后,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量是危机前的16倍,占印度全部石油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成为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①俄罗斯一直对印保持着最大武器装备出口国的地位,2000—2020年以来,印度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总额占据印度购买武器总额的64.4%以上。^②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印度积极参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或有意平衡其在西方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二十国集团中的影响力。对于美国拉拢印度加入“亚太版北约”,印外长苏杰生明确表示,“北约似乎是美国观察世界的唯一模式,但并不适合印度”。印度国内有分析认为,本国扩大与北约的合作,不仅将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危及印度战略自主,还将使印度被迫卷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③同时,近年来美国对于印度人权状况颇有微词。2022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指责印度人权问题;2023年美国务院发布人权报告,指责印度存在随意处决罪犯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印度主动深化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根本的目的是寻求自身权益最大化,而不是成为美国的战略工具。同时美国虽然在“印太”合作上倚重印度,但对于亚太安全博弈,则更加重视欧洲传统盟友的支持。

① “Insight: India’s Oil Deals with Russia Dent Decades-old Dollar Dominance,”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urrencies/indias-oil-deals-with-russia-dent-decades-old-dollar-dominance-2023-03-08/>.

② 童宇韬:《印度与俄美两国的军购合作关系比较研究》,《南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113页。

③ Ajeet Kumar, “India Reject US’ Offer Ahead of PM Modi Visit: Not Suitable, Has No Intention of Joining NATO Plus...,” *India TV News*, June 09, 2023, <https://www.indiatvnews.com/news/india/india-rejects-us-congressional-committee-recommendation-of-india-joining-nato-plus-member-pm-modi-visit-to-us-jaishankar-on-nato-joining-new-delhi-2023-06-08-875003>.

与之类似,虽然印度和东盟的安全合作不断深入,但双方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差异。印度加强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旨在强化自身军事存在,制衡中国和扩大地区影响力,东盟则希望通过多边平台加强地区安全合作,为东盟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印度过度介入亚太安全不仅是对东盟主导地位的威胁,而且可能导致亚太国家的割裂和对抗,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东盟与印度的安全合作很难持续深入。同时双方在涉及亚太的多个议题上也存在利益分歧。例如南海问题上,菲律宾、越南等主权声索国加大对南海的介入,希望东盟一致对外对抗中国,维护东盟国家在南海的利益,这为其与印度在南海问题上加强合作提供了机会。但是柬埔寨、印尼等其他成员国并不同意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强硬对抗,避免选边站队。对于“印太战略”,越南、印尼和泰国认为可以为自己带来发展机遇,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老挝、柬埔寨等陆地国家态度一直较为谨慎和疏离。对于海上安全合作,东盟主要希望印度在打击海上恐怖主义、维护马六甲海峡航道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方面发挥作用,并不支持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印度作为亚太安全合作对象的优先性也不高,并被基本排于日韩澳等国之后。

近年受“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东盟论”的恶意传播,个别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产生恐惧,并出于平衡中美安全竞争的需要,开始实行“大国平衡战略”,但这无法改变中国和东盟良好的合作前景。首先是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经贸往来、互联互通建设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以来双方互为对方最大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次是中国致力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美国同盟体系以“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撼动了东盟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然而中国颁布《中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文件》,坚定支持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结构。同时双方都致力于维护和平稳定的亚太地

区秩序,东盟发布《东盟政治共同体蓝图2025》,描绘构建一个团结、和平、稳定、有韧性的东盟区域蓝图。对于东盟国家而言,一个和平稳定的亚太更有利于其长远利益,东盟偏好的亚太地区秩序是以安全和经济合作为导向,以东盟为核心的多元地区共同体。^①由此可见,维护和平稳定的亚太,加强经济合作仍是未来中国和东盟的主旋律,印度意欲撬动东盟在亚太安全上对抗中国的目标很难实现,东盟不会眼见亚太地区沦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对于印度对抗中国,恶化亚太安全局势的行为也将保持警惕。

第三,印度海军军备制造能力难以支撑远洋战略。莫迪政府新一轮军改下,提出2026年实现70%国防产品本土化制造目标,^②未来印度持续深度介入亚太安全,与能否成功实现海军军备本土化制造目标密切相关。印度发布《海军本土化计划2015—2030》,旨在对46类装备以及战舰设备完成本土化生产,但目前仍然面临不少问题。海军预算占国防预算比例最低,维持在14.2%至18.9%的水平,空军保持在20%,陆军占50%以上。2023年印度国防预算同比增加13%,其中海军预算占比15.5%,空军19.1%,陆军57.1%,^③且海军现代化装备建设费用缺口最大,根据2021年统计数据,印度海陆空三军面临的现代化预算缺口分别为:4.57亿美元、1.23亿美元、3.0亿美元。^④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无力自主设计和建造常规潜艇,^⑤印度西部海军司令部司令鲁特拉中将公开批评印度的舰艇生产速度大大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指出2—2.5年足以建造一艘护卫舰,而印度需耗时8—9年,印度海

① 吴心伯:《论亚太大变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第6期,第56页。

② 李侨:《2022年印度深度军事改革探析》,《坦克装甲车辆》,2022年第16期,第38页。

③ “Military Balance Blog, Personnel vs. Capital: the Indian Defense Budget,” IISS,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military-balance/2023/04/indian-defense-budget/>.

④ Laxman Kumar Behera, “Bigger, not Necessarily Better: India’s Defense Budget 2022-23, Observa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February 23, 2022,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bigger-not-necessarily-better/>.

⑤ 李侨:《2022年印度深度军事改革探析》,《坦克装甲车辆》,2022年第16期,第41页。

军直升机和潜艇的列装速度赶不上舰艇的服役进度。^①现代化军事装备制造需要集成化建设、体系化应用,对于一个国防装备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短期内要突破技术限制,实现国防领域的自力更生存在不少困难。印度海军军备自主性不足,将一定程度限制印度在亚太大规模投送军力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印度海军能力不足,无法在印度洋以外的海域持续行动,印度对东盟的安全承诺都是空头支票,一旦危机来临根本无法兑现。”^②

结语

总的来说,印度在“东进政策”指引下,企图在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全面加强和亚太地区的联系,美国“印太战略”提供的机遇,加上印度“世界大国梦”的催化,促使印度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雄心和举动愈发突显。印度在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过程中,非常注重策略选择,在多边、双边不同层次与不同国家重点进行不同领域的安全合作。印度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目的是从战略上制衡中国以及增强印度的实力和影响力,但介入能力仍然有限,而且也受到亚太政治博弈的制约,尤其是印度与美国、东盟在战略目标上的差异。对于印度而言,与其向东扩张强撑大国梦,不如坚守印度洋的阵地。亚太地区对印度的意义在于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正如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指出:“印度应始终致力于为亚太地区国家构建一个安全架构,以利于营造一个印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环境。”^③

^① “Our Ship Build Periods Are Longer than Global Averages: Vice -Admiral Girish Luthra,” *Indian Express*, July 16, 2018,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our-ship-build-periods-are-longer-than-global-averages-vice-admiral-girish-luthra-5261076/>.

^② Rohan Mukherjee, “East by Southeast: Three Challenges for India’s ‘Act East’ Policy,” *Business Standard*, January 14, 2020,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economy-policy/east-by-southeast-three-challenges-for-india-s-act-east-policy-118012300197_1.html.

^③ “India for Build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pacific: Menon,” *Business Standard*, February 3, 2014,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india-for-buidlding-security-architecture-in-asia-pacific-menon-114020300277_1.html.

当前印度不断自诩“全球南方”领袖形象，东南亚国家是其拉拢的重要对象，未来印度政府可能还将继续强化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并具备以下发展趋势。一是突破“净安全提供者”角色。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将其定位为“净安全提供者”，作为亚太国家眼中的“替代性大国”，承担维护共同安全的部分责任。接下来，为配合莫迪政府在亚太实现地区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前景，印度海军或将不受“净安全提供者”的束缚，实施更有进攻性的安全政策。二是跳出既有安全合作框架。随着中印竞争加强，以及印度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升，印度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更加自主，印度或进一步突破多边安全框架，以各类双边、小多边形式加强与亚太主要国家的合作，实现制衡中国同时摆脱美国绑定的双重目的。同时印度虽明确拒绝加入“北约+”，但由于北约国家纷纷涉足“印太”战略需求，双方安全合作向亚太地区拓展不可避免。三是强化对南太平洋安全关注。目前印度干预南太平洋地区安全议题的抓手有限，未来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将是其战略重点，以澳大利亚为中转站，通过在其附近海域开展军事演习等方式，持续提升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感。■

（责任编辑：吴兴佐）

Abstracts

Trend of the Changing EU Power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e under Ukraine Crisis

Zhang Jian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has accelerated the adjustment and changing power pattern of the European Union. Germany does not play the role model as it used to, it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make contributions have declined, and it has become a follower rather than a leader in crisis response. The “Atlantics” dominated the EU, and the “Europeans” were weakened. Germany’s all-round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ed. France has lost traction on the EU, the German–French axis is absent, and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and Nor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gaining momentum. Compared with other EU institutions and member states,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been enhanced, leading the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participating more in the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geo-politicization of EU economic policies. These changes will increase internal disputes within the EU, weaken the EU’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and reduce th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EU’s China policy.

Keywords:

Ukraine crisis, European Union, pattern of power, Sino–European relations

Minilateral Diplomacy und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Indo–Pacific” Strategy

Yu Hailong

Abstract:

As Japan’s shift to the right intensifi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accelerated its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and carries out multi-layered minilateral diplomacy unde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is diplomacy aims to make up for Japan’s lack of power, unite other countries to balance China’s rise and reduce Japan’s security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mutual assistance, external antagonism, Japan–US centrality, securitization of issues, and networking of cooperation.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Japan’s minilateral diplomacy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Cold War thinking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ich intensifi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surrounding areas, hinders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provides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Japan to escape from the postwar regime. Japan’s minilateral diplomacy is faced with constraints such as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on mechanisms, endogenous uncertainties, asymmetrical statu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China. Therefore, it will inevitably mak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minilateral diplomacy ineffective. China could do a lot in countering minilateral diplomacy that is highly oriented towards China.

Keywords:

minilateral diplomacy, Japanese diplomacy, “Indo–Pacific” strateg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Modi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Song Wei and Zhang Wang

Abstract:

Since Modi came to power in 2014, India has implemented a strategic adjustment from “Look East” to an “Act East.” Further integration in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ecu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dia’s national strategy. The current

intervention of the Modi government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relying on the ASEAN-centric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terven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collabo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operat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tralia to strengthen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presence, as well as expanding influ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India’s increased involvement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is partly due to its geopolitical interests in balancing China, and partly becaus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a priority direction for India to surpass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and advance its dream of becoming a world power. The reason why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become its priority is mainly based on the game pattern between India’s neighboring powers and India’s cultur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l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rn India,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India and its major partners in confronting China, and the inability of the Indian Navy’s domestic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to support its deep-sea strategy, India’s intervention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still faces many constraints.

Keywords:

“Act East Policy”, Asia–Pacific security,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Ladd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Toward China

Liu Jin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omprehensive decoupl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China,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is characterized by “laddering decoupling” in terms of objectives, contents, paths, tools, and instruments.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laddering 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driven by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gendas, and a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conomy. The latest adjustmen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is increasingly confusing and dangerous. However, the laddering strategy is flawed by the US incapability of providing matching power,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trategic benefits and costs, and the US hegemony hinder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toward China fails to achieve its intended targets.

Keywords:

US, Biden administ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US–China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New National Strategic Vision of “Century of Türkiye”

Liang Qin and Li Yubo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new national strategic vision of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was put forward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involves not only Türkiye’s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security and diplomacy, but also its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next hundred years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its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new national strategy stems from the electoral needs of Erdogan and his party, the response to the new geopolitical realities, and the Turkish ideal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The success of the vision of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will depend not only on Türkiye’s efforts, but also on the trends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severe neighboring situation will greatly limit the possibility for Türkiye to achieve its goal.

Keywords:

emerging economy, Century of Türkiye, national strategy, Black Sea regional security, Erdogan